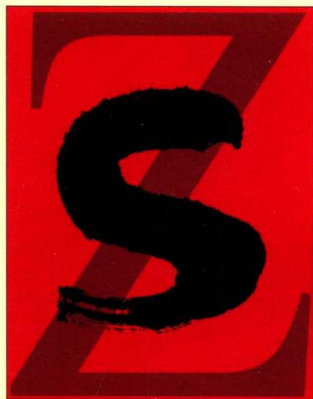


“十里红妆”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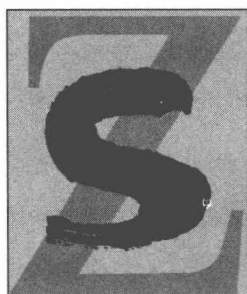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Red Dowry Culture” in Jiangnan Area**

● 赵福莲 / 著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

“十里红妆”初探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Red Dowry Culture”
in Jiangnan Area**

● 赵福莲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里红妆”初探/赵福莲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3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

ISBN 978-7-5097-4240-2

I. ①十… II. ①赵… III. ①婚姻-风俗习惯-研究-浙江省 IV. ①K892.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4828 号

·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

“十里红妆”初探

著 者 / 赵福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周志静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白 云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清湘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23.75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319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240-2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省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成果

立足地方实践 高扬中国特色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总序

人类社会踏上了充满挑战和希望的 21 世纪，世界各种文明和思想文化经历着深刻的激荡和变革。面对这样的形势，坚持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因此，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职责的哲学社会科学，任重而道远。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是人类历史中前无古人的创举，需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不懈的探索，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胡锦涛同志 2003 年 7 月 1 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的征程中，我们将长期面对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

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这三个重大课题为主攻方向，同党和人民一道，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研究，努力解决广大群众关心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共中央在2004年3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辟地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 and 作用，指明了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这个文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必将唤起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于中国人民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使命感，迎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又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

地方社会科学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多年来，除台湾省之外，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分计划单列市先后建立了社会科学院，总数已经达到44家。可以说，地方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在各

省（市）党委、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地方社会科学院在队伍建设、科研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可贵的经验，涌现出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大批立足地方实践、富有地方特色的优秀科研成果，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立足地方特色，紧密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地方社会科学院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相信《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作为一个多系列精品工程的编辑出版，能够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展示地方社会科学院的优秀科研成果及其固有特色，激励和推动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提高，有益于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繁荣社会主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大家共勉，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迎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美好明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4年8月15日

承继浙学优秀传统 促进当代学术繁荣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序

浙江学术有很多优秀的传统。

首先一点，浙江学术富有批判精神。汉代中期以后独尊儒学，当时的儒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墨守章句之学；二是盛行讖纬迷信。浙江人王充“退孔孟而进黄老”，对传统儒学提出尖锐批评，提出“神灭无鬼”的新说。他所开创的学术新风气对后来魏晋玄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新儒学产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学术流派。浙江产生了“浙学”，即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及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他们倡言事功，充分强调“利”的正当性。在南宋三大儒学流派中，他们于朱、陆两家之外独树一帜，不但成为宋学不可或缺的一支，也对此后浙江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之后，程朱理学定于一尊，至明后期，余姚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新说，突破朱熹“天理”的绝对性，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晚明文学艺术界有一股提倡人性解放、不拘一格抒发性灵的社会思潮，王氏之学，有以导之。至清代，考据之学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浙江学者，不但为后人贡献了大量考据学上的成果，而且产生了章学诚这样的反潮流的学术大师，他强调“六经皆史”，标榜“浙东学术”的独特个性，与吴、皖两家相颉颃。至于清末，学风再变，程朱理学与经世思潮重新抬头，浙江不但产生了龚自珍这样的新思

潮的代表人物，还产生了孙诒让、黄以周、俞樾这样的朴学大师，号“清末三先生”。综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浙江学人在其中的地位清晰可见：他们未必是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主导者，却常常是某一时期主流学术的批判者；而他们所开创的学术新风，又常常引导着下一时期的学术新方向。浙江学人的这种批判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精神。

浙江学术的另一优秀传统是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南宋“浙学”思想家们主张重商富民，正是这一学术传统的体现。到明清时期，浙江学人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发展。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宗羲，不但在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在政治上更是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前所未有的批评，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不朽的标杆。清代浙江学术的地域风格已经形成。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浙东学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研究上。清代文禁极严，明史研究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学术领域。浙江受文字狱之祸极深，著名的“明史案”便发生在浙江。当时很多历史学家为了避祸，在研究中有意避开这一禁区，专攻古史考证。而浙江学人，敢于逆流而上，浙东学派尤以明史研究见长。黄宗羲撰《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明儒学案》，选编《明文海》；万斯同一生专治明史，独力完成《明史稿》五百卷；邵廷采撰《东南纪事》、《西南纪事》、《明遗民所知录》；全祖望著《鮑埼亭集》，撰集碑记，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浙东学人的明史研究，表面上是研究历史，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政治问题，他们的学问，表面上是史学，骨子里是政治学。在这一点上，浙江学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可理解成是一种革命精神。至于近代，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他的学术成就固以朴学见长，但在他的学术理论中，“种族革命”的特色表现得特别浓厚。这与浙东学派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一种对现实不回避的态度与勇气。

浙江学术的第三个传统是包容的态度和开放的精神。浙江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国的中间地带。在历史上，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黄巢起

义、靖康之变，数次大事件引发的移民浪潮，都对浙江学术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南宋“浙学”三家，婺学（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本来就是北方世家；永嘉学派，源自北宋“永嘉九先生”，他们与“二程”有师承关系。各种区域文化的交汇碰撞，造就了浙江学人包容的、学习的态度。浙江又地处沿海，在明清以后“地理大发现”的国际背景中，又成为“西学东渐”的前沿。早在明末，就有杭州人李之藻，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习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科目的引进和建立中，浙江学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沈家本在法学上，蔡元培在教育学上，马寅初在经济学上，都堪称是一个学科的开创者或奠基人。蔡元培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以“兼容并蓄”治校，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培育了土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以“拿来主义”的态度译介西方文学，并用新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旧学问开始转型。海宁人王国维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有着巨大影响的国学大师，在哲学、文学、史学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在哲学上，他是中国最早介绍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等人哲学思想的人，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最早运用西方美学对《红楼梦》进行学术批评的著作；在文学上，他著有《人间词话》，提出“境界”与“意境”说；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最早对甲骨文进行识读且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学者之一，他首创“二重证据法”，将甲骨文与存世文献进行对照分析，使商朝历史成为信史。

浙江先贤的学术传统，是我们不朽的楷模。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坚持以科研为中心，坚持以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突出浙江特色，强化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和为全省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功能，为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贡献。为了更好地发挥传

承文明、创新理论的功能，推进“精品工程”和“人才工程”的实施，从2001年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设立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资金，陆续推出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从2004年起，又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丛书，使科研成果的出版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扩大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影响。

这些学术成果，有的重视社会调查，重视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关注浙江社会经济现实的现实问题；有的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整理、地方史事的钩沉以及区域文化的理论探讨；当然，其中不乏越出地域之囿、站在学术前沿的创新之作。这些成果，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有些问题在学术上还有争论，有的还有待社会实践以及学术自身的发展来检验，但它们有鉴别、有批判、有创新，这正体现了浙江学术的优秀传统。

林吕建

2009年

前 言

法不孤起，依境而生。

一切都是缘起的。

如果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产生，那么，也就没有《“十里红妆”初探》这本书了。

话说从头。

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2届会议在巴黎举行。在这个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一项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国际公约，也为各成员国制定相关国内法提供了国际法之依据。该《公约》规定：必须满30个国家申请加入公约后方能生效。2006年1月20日，罗马尼亚成为第30个缔约国。

《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作了规定：（1）口头传统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那么，有人会问，《公约》是做什么的呢？有没有宗旨呢？答案是肯定的，内容有：（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4）开展国际合作及

提供国际援助。

早在 2003 年通过《公约》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从 2001 年开始评选，规定每两年一次，每次每国只可申报一个项目，如果多国联合申报就不占名额。2001 年 5 月 18 日，我国的昆曲艺术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3 年 11 月 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的古琴艺术榜上有名。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称为“活着的人类财富”，而中国是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对“非遗”的工作也非常重视，紧随着昆曲与古琴两大艺术门类被列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12 月 2 日，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公约》批准书，成为世界上第 6 个递交批准书的国家。

2003 年，中国确立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 年 5 月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公布了第二批。2010 年 6 月第三批名录公布了。

浙江省政府领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相当重视，不仅把这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还专门制定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条例分七章四十八条，于 2007 年 6 月 1 日实施。条例中有一条要求全省各地的相关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应的抢救措施，如采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真实、完整的记录、整理；征集、收购相关资料、实物，保存、保护相关建筑物、场所，等等。条例内容非常详细，凡是涉及“非遗”范围的问题都写进去了，完全可以作为样本来对照。

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从之。

从国际到国内都在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那么，各个基层更是无不视此为文化建设中的大事。一时间，上上下下，都在做“非遗”的文章，如组织人员撰写“非遗”代表作丛书，拍摄一系列“非遗”方面的电影。如《高甲第一丑》，再现了高甲戏柯派丑行表演艺术的创始人、福建晋江人柯贤溪传奇的一生。《爱在廊桥》，以中国稀有的古老剧种——迄今300多年历史的北路戏以及寿宁县独特的民俗民情事象为背景，展现了边陲小镇上人们朴素的生活与执著。《十里红妆》，讲述20世纪初，一个身怀绝技的年轻木匠，为浙东一富家待嫁小姐赶制“十里红妆”时，与这位小姐发生的一段爱情故事。虽因悬殊的社会地位及传统偏见，小木匠最终只能为他人做嫁妆，未能与小姐成亲，但他所打造的精美绝伦的“十里红妆”，成为伴随小姐一生的思念与安慰，也为民俗文化尤其是红妆文化添光加彩。这部影片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思考性，观看的人无不被片中精美的红妆工艺和丰厚的红妆文化所倾倒，感受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类似于这种“非遗”电影，全国各地都在拍，包括原生态的文化与音乐等。

近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被人们说得很“熟”了，可以说是熟“透”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非遗”的抢救与保护只是我们做好文化工作的一个机缘，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来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借此机会纠正自己以往对这一份工作的疏忽与轻慢。

正因为有这么一股良好的风气，我们可以借风使舵，把多年来那颗浮泛的心安顿下来，摒弃一些外来的文化糟粕，重新把我们老祖宗的文化精华继承弘扬开来，以荡涤被染污了的心灵。

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之下，《“十里红妆”初探》才作为一个课题报上去，然后被审核通过。

“十里红妆”这个词也是近些年来才时兴起来的，原本是个形容

词，人们爱用“十里红妆，千亩良田”来形容古代嫁妆之丰厚；现在，“十里红妆”成为名词了。其实，“十里红妆”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古代嫁女时的嫁妆器具，因器具非常丰厚，前后绵延数里之长；一是指浙东特有的婚俗或者说婚俗文化。虽说是两个方面，但却是一个整体，两者缺一不可。离开了“十里之长”的红妆器具，也就没有了浙东特有的婚俗；离开了浙东特有的婚俗，也就不可能有具体的“十里红妆”器具。故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有人说：“十里红妆”就是指红妆器具，与地区无关；也有人说：“十里红妆”就是指浙东特有的婚俗，与红妆器具多少没有关系。这两种说法均有偏颇，我们知道，“十里红妆”是有特定的时间与地域概念的，是指南宋之后，流行在宁波、绍兴地区的一种婚俗文化。何以在这两个地区盛行这种红妆文化呢？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会谈到的，这里只作简单的说明：南宋南迁时，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大量的信息与财富，人口剧增，经济增长，皇家文化、皇室礼仪随之南下，并与民间文化迅速融合。康王南逃杭州之后，继续南逃，最先到达的地区就是绍兴与宁波等地。天子所到之地，与天子不到之地的不同之处在于：天子所到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相对发达，故在古代就有“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之说，意谓绍兴地区师爷多，宁波地区商家多。无论是当官的，还是经商的，都有钱。有钱总爱用物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十里红妆”这一物化形态的产生也就不奇怪了。

多年来，人们对于“十里红妆”，一直把它作为趣谈，譬如“浙东女子尽封王”这个传说，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传说的，压根儿没去想过，这个传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历史事实？或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没有一些关联的东西？康王到底有没有来过传说中所说的那些地点？另外，“十里红妆”中的“十里”是一个虚词，无非指嫁妆之丰，抬在路上有几里之长。浙东地区的“十里红妆”与嫁妆不是一个概念，

嫁妆是嫁妆，“十里红妆”是“十里红妆”。嫁妆是结婚时所抬的一些日用器具，不讲究多少。那么，真正的“十里红妆”，其规模到底是怎样的？大大小小，每一副嫁妆由几个人抬？前后两副嫁妆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十里路需要多少副嫁妆？需要多少个人来抬嫁妆？“十里红妆”婚俗反映了古代人们什么样的心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十里红妆”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它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有没有造成难以为继的局面？这个婚俗对社会造成了哪些正面与负面的影响？这样的婚俗文化如何评价其历史与现实意义？这些问题，如果不作深入研究的话，是不可能搞明白的。

接手了这个课题我才知道，研究“十里红妆”的资料太少太少！之前，没有人写过“十里红妆”的研究专著。倒是有几本关于介绍“十里红妆”的书，图文并茂，煞是好看，写出来的东西很有趣，我也非常喜欢读，但对深入研究“十里红妆”，似乎帮助不大。因为这些书写作的目的与角度不一样，读者群体也不相同，所以，可读性与娱乐性强于资料性。而本书的探索，希望能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入，不敢说研究，只能说是摸索着前行。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接了课题总不能干坐着，等研究资料从天上掉下来。我始终相信：天上只会下雨下冰雹，绝不会掉馅饼送资料。

于是，笔者到各地去采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有宁波、宁海、台州、绍兴、诸暨、嵊州、新昌等地。先是打听当地对民间、民俗文化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然后约好时间、地点，前去拜访与采访。这么一路走下来，确实令笔者惊叹不已，原来，红妆文化在宁绍地区尤其是宁海一带，丰富到了惊人之地步！红妆工艺之精湛、之绝伦、之高超、之独特、之少见，在我之前的知识层面里，是想都不敢想象的。

采访回来，笔者把采访稿进行整理、归纳、分类，列出了提纲与目录。在这部书稿里，令人欣慰的是，笔者查找了大量民间史料，终